

“死线抽绎”——传播话语的两极分化

朱效民

1

2010年9月17日，事后才知道这是值得北京市民记住的重要日子——又一个全北京交通大瘫痪的日子。偏偏这一天我们赶火车！我们家老太太因觉得腿脚上下地铁不方便，执意要坐公共汽车，至于打出租车，在她们这辈人眼里那是不到千钧一发、万不得已的时候是绝不在考虑之列的。好在老太太每次往返北京和新疆都坐过这公共汽车，正常的话也就一个半小时以内的路程（最快的一次40分钟就到了）。17号这天，我们匆匆吃过午饭提前4个小时就出发了，刨去火车站候车、检票、上车约45分钟的时间，我们整整打了比正常时间一倍还多的提前量。所以，当坐上直达西客站的公共汽车后心情是十分惬意和舒畅的。车走到大约一半时，阴沉的天开始下毛毛雨，不久车速就慢下来了，再后来简直干脆不动窝了。眼瞅着离火车发车的时间越来越近，而交通却一点起色也没有。我们心里开始打鼓，赶紧下车，想找出租车，才发现情况已大为不妙，一则几乎没有，二则即使逮着一辆，出租车司机也好心相劝：赶紧找地铁吧，这会儿不管什么车都动不了。于是冒雨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又在离西客站最近的地铁军事博物馆站回到地面，同样还是打不着出租车，公共汽车也动不了。眼看火车就要发车了，这时才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了，无论多么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会儿一样也靠不住。只好陪着老太太一步一步地像是凭着惯

性挪到火车站，可是火车已经于20分钟前开走了，车票作废！茫然中经人指点将卧铺票退换成了第二天同次列车的站票，这也只能是一点儿心理安慰而已，让老太太第二天乘站票回去，那连想都不要想。

深夜返回家，老太太大发感慨，先是撂下狠话：这辈子再不回新疆了，就在北京住下了。随后开始分析原因，最终断定是出门太晚，总结指出以后晚上的火车上午就要向火车站进发，中午饭在火车站就地解决！她们这一代人永远都是在找自己的不是，出现任何问题都一再反省自己哪一点做得还不够好，丝毫也没有对社会有什么怨言。要知道，这张600多元的返疆火车卧铺票相当于她半个月的退休金啊。我们家老太太可也算得上是新中国的老革命了，中学没毕业就从四川坐着解放军的敞篷卡车直接去西藏参加土改去了，当时她所在的中学，全校也就两个选拔名额，在那个时候可是天大的荣誉，不是共青团员的压根儿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后因西藏土改失败返回四川，接着又奔赴大西北支边“修理地球”。在新疆建设兵团同样干得热火朝天，成为先进典型，曾先后立过两次三等功。需要说明的是，新疆建设兵团虽然号称“兵团”，却没有仗可打，这两个三等功可不是因为作战勇敢，而是靠半夜就爬起来上大田里拉粪干活、拼命突击挣工分挣出来的。

老太太不断地抱怨着自己的不是，唠叨着下次赶火车要注意的地方，可我觉得这责任不

收稿日期：2012-05-12

作者简介：朱效民，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

Email: zhuxm1207@sina.com。

应该全怪在赶路的人身上。

颇代表大国气象的北京西客站已经建成N多年了，与地铁一号线“军事博物馆”站只相隔短短的几百米，与老北京站也没多远，可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为何就始终不能通上地铁相互联结呢？如果说公共汽车在大街上跑，受红绿灯的管制和复杂路况的影响难以保障准点多少还能够理解的话，那唯一有点儿准头的地铁为什么偏偏不与准点发车的火车站相连呢？赶火车的人无不是大包小包的，走这几百米或者再倒腾公共汽车、出租车那也是非常麻烦的啊！恢宏大气的北京西客站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光鲜亮丽、唯我独尊的首都之门吗？

我平时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以前美其名曰爱好运动，现在按时髦又好听的话说是低碳出行。但有时也免不了要进城开会办个事之类的，从家里出来直接到地铁“上地”站坐车进城是最快捷的。遇到上班高峰期那叫一个人满为患，离车站大门几十米开外长长的队伍就让你立即体验到什么叫作“摩肩接踵”，好不容易一步一个脚印地挪到站台上，才刚刚到了真正考验的时候。列车进站了，车厢里面同样是人头攒动，要把自己再塞进去那绝对是个不小的力气活儿，况且周边的人谁也不是吃素的，在上班迟到的压力下哪个不是虎视眈眈、奋勇向前。凭着自己的身子骨还算结实（学校运动会每年都能给系里挣两个投掷项目的名次回来），我每次都是隐藏软实力、突出硬实力往上冲，就是这样经常也要奋斗两三个回合才能够挤得上一趟车。一些女士自知排队无望，靠体力拼搏上车更属天方夜谭，故而索性站在一旁冷眼观看其他人的相互“拼杀”。进车厢后大家像罐装沙丁鱼似的前心贴着后背，在冬日即使隔着厚厚的两套冬装仍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彼此呼吸的一起一伏。高峰期乘坐地铁我只是偶尔为之已深感大为不易，那些天天朝九晚五上下班、每日不得不与地铁“亲密接触”的“BMW”^①们该是何等辛苦！

都知道北京的回龙观小区人口密度大，尤

其是每天早上上班、晚下班的时候地铁里更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为何奥运地铁专线不连接上回龙观站分流一下呢——在普通的北京市交通地图上，两站之间就那么一指头宽的距离啊？红红火火的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整整3年了，至今，奥运专线仍然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孤悬着那么几站。这类曾经风光过、也的确给大伙儿脸上贴过金的“奥林匹克遗产”何时才能转化为小家居民们真正能够享受的日常福祉，从而让北京奥运的光荣和梦想能够真正在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中扎下根、结出果来？

几年前，曾趁着春光明媚的桃花节去北京植物园游玩，出来时天色已晚，忽然发现公园大门之外、马路两边是人声鼎沸、人影幢幢，马路中间是大车小车排成长龙，然而却空有一副副钢铁筋骨，根本无法动弹。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站在马路边，不出一刻钟就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越是交通拥堵，越是要优先保障公共交通。天色彻底暗下来了，我意识到等车无望只好继续发挥徒步旅行的精神向市内进发，期望能在远离满坑满谷的滞留游客的地方找到能行走的交通工具。沿途有许多老人疲惫地坐在路边，他们可能逛公园已经累了，走不动了，舍不得打车（也不可能打上车），只能默默地、无奈地等着交通堵塞结束的那一刻，而这一刻却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次在马路边走得腿酸脚麻的经历使我获得一份重要的旅游经验：绝不能在节假日，包括周末去景点旅游！仅仅一个普通的交通管理问题就会让你游兴全无，只能面对新扩建的漂亮等级公路和凌空飞翔的立交桥徒唤奈何。

2

俗话说，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生活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尽管我们的载人飞船又上天了，我们的科研论文在国际上发表数量的名次又靠前的了，我们的GDP更是一国之下、万国之上了，北京的电视上经常报喜讯，说本市又建成了什么高架桥、又修了多少公里

^① “BMW”原意指宝马来，这里的意思是指那些上班族每天先乘公共汽车或者骑自行车(Bus/Bicycle)、然后换乘地铁(Metro)、出了地铁再步行一段路(Walk)到达工作地点。在一些大城市中，“BMW”已形成了巨大的群体。

的地铁、六环又开通了哪一部分,然而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其实是没有多少感觉的,他们不可能像领导干部那样去轰轰烈烈地视察剪彩一通、神采飞扬地指导展望一番。即使再宏伟的成就,他们也是靠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去体验,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具微而观的感受,前面那些无论看起来多么辉煌、气派的数字和成就对普通百姓来说都只能是一堆冰冷的、没有知觉的符号。一场小雨就把北京经过奥运会盛妆打扮的交通体系淋回了原形,原来,我们首都(据说现在也叫“首堵”)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以致雨再大点,大伙儿就得渡“海”回家了——这,才更可能是老百姓们切身真实而又刻骨铭心的感受……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在信息宣传和观念传播的过程中经常存在着一种语言上的误用,被称作“死线上的抽绎”现象^[1]。它是指语言被捆死在某一条抽绎水平线上,使得传播的语言或者被固定在过高的水平线上使人难以理解、敬而远之;或者相反,传播的语言被限定在过低的水平线上又使人不得要领、感觉乏味,从而均导致传播的效果事倍功半、大打折扣。例如当社会上的信息传播中充满了诸如“民主、法制”,“复兴、崛起”等高度抽绎水平线上的字眼,同时又没有相对低度抽绎水平线上的词汇进行配套阐释时,如此传播的信息就会让普通人觉得抽象难懂、与己无关,从而根本无法认同。要克服这一传播困境,就要求传播的语言信息根据传播对象、实际内容和文体特点等不同情形沿着抽绎阶梯适当地做上下波动、有涨有落,既要有相对高抽绎水平的宏观概括和总结,也要有相对低抽绎水平的微观描绘和体验。通俗一点来说,不仅要讲宏观层面(如国家、社会整体的进步)的大道理,也要讲微观层面(如家庭、个人具体的感受)的小道理,二者兼顾互动才能有利于促进社会上下的广泛理解以及相互尊重,并进而有助于凝聚更多的认同和共识。

在科学传播中,通过调查统计也很早就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公众对科学的认知

往往有自己的优先顺序和独特视角。如统计表明,西方公众感兴趣的科技知识领域排在最前面的基本上总是医药健康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领域,因而科学传播的重点内容和切入点常被形象地说成是关于身体的科学和关于身边的科学。同时研究发现,公众会运用他们自己已有的概念范畴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重新解码^[2],甚至可能以传播者截然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的方式来重新解释传播给他们的信息。这也就是说,从受传者的角度看,外在的大道理是要靠其内在的小道理来理解和感受的。

战后美国独领风骚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后期,科学家们试图一鼓作气、直捣黄龙,雄心勃勃地又提出了登陆火星的计划,但旋即遭到美国议会的否决。美国人民在最初的举国兴奋之后发现“阿波罗”登月计划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看完一次次激动人心的电视实况转播后他们该干吗还得干吗,毋庸讳言,这也与当时美苏两国在太空军备竞赛、激烈竞争的压力下导致“阿波罗”计划较少考虑经济效益有关。美国人民质疑:为什么科学家更关心38万公里以外的东西?花了200亿美金就带回来几包土——尽管是月球上的土,可这对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又有多少意义呢!这表明,堂而皇之的大道理需要依靠亲切朴实的小道理进行解读和支撑,否则结果很可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力于我何有哉”!此外,根据当前传播学的交互理论,如果被传播者表示质疑、甚至拒绝接受,或者没有感觉、无动于衷,那绝不是因为他们脑子笨、理解力差,而多半是因为传播大道理的人自己“嘴聋”。英国相关数据调查显示:“苛刻的质问可能标志着全体公民更有见识,更具科学素养。”^[3]

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能物理研究事业遭遇重大挫折,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的超级超导对撞机(SSC)项目被否决,其电子对撞机规模庞大、耗资不菲的地下运行隧道在今天的一个实际用途只是“养蘑菇”^[4],因为那里面冬暖夏凉。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哀叹:这是二战

后该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最大失败，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没有得到广大美国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可。想想要让普通百姓认可科学家每年花费 20 亿美元去找几个反粒子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绝非科学家说出一番探索宇宙奥秘的大道理就能够轻松化解的。法国传播学者多米尼克·吴尔敦就此深刻指出，信息传递不等于传播，传播不等于传通，因为后者涉及受传者的“他异性”问题，今天的传播决不仅仅是个技术进步的问题，信息时代的“‘地球村’是一个技术现实，但不是社会或文化现实”，“互联网是一个梦想，或者说是技术层面的幻想”，因而需要将“无法传通纳入到传通的范围，倡导共处”^[5]，即要在传播活动中承认存在无法传通、无法分享的现实，也即承认和尊重不同人群在语言、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

3

近年来，从三聚氰胺、毒大米，到爆炸西瓜、地沟油……食品安全问题如今是花样繁多、层出不穷，人们顿顿不能离开的日常食物的安全居然都陷入了一个又一个“门”的阴影而难以挣脱。2011 年 7 月，微博上有消息称：“日式拉面的香味都是用专门的汤粉调制出来的，每碗汤的成本不过几毛钱，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老汤，连卖汤料的小贩都说这东西不能总吃。”该微博引起多方关注后，味千拉面负责人承认汤底是由浓缩液兑制而成，但同时称该浓缩液是由猪骨熬制所得。针对网友质疑味千拉面删除官网相关内容一事，味千拉面又表示“计算出错”。2011 年 8 月 8 日的香港凤凰电视台品牌栏目《锵锵三人行》的嘉宾查建英针对味千方面说谎一事感慨道：“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不是说创造性不够，而是说假话不脸红。”无独有偶，历史学家兼文化学者葛剑雄也有过类似的感叹：“在西方国家，只

有政客需要有双重人格，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上必须说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在中国，连小学生也得必备双重人格。如果作文写了‘我不喜欢世博会，挤死了’，这篇作文很可能不及格。”^[6]不用说，这与我们的教育、宣传一向习惯于讲宏观的、高层次的大道理，而忽视基本的、身边的小道理，也即囿于传播上的“死线抽绎”问题脱不了干系。

曾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里学到的，他坦诚地回答道，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在上幼儿园时学到的，如饭前洗手、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领取玩具和做游戏时要排队、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等。由此也可见，如果连诸如诚实、诚信这类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从不起眼的“最基本”这个角度说也可以视为“小道理”）都不被认同和遵守的话，或者只是表面上认同，实际上“假大空”横行——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一日三餐都因此而有安全之虞……传播和奢谈“大国崛起”、“中国速度”之类的空泛大道理将是怎样一幅空中楼阁的景象，其传播的实际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参考文献

- [1] 邵培仁. 传播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187.
- [2] 斯蒂文·小约翰. 传播理论[M]. 陈德民, 叶晓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22.
- [3] 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 科学与社会[M]. 张卜天, 张东林, 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32.
- [4] 迈诺尔夫·迪尔克斯, 克劳迪娅·冯·格罗特.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M]. 田松, 卢春明, 陈欢, 等, 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30.
- [5] 多米尼克·吴尔敦. 信息不等于传播[M]. 宋嘉宁,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16, 35, 88.
- [6] 言论[J]. 读者, 2011(6): 15.

(责任编辑 颜燕)